

从《水浒传》看中国专制社会下社会公义的缺失

张文成

(淮海工学院 文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要:《水浒传》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它以其深刻和真实为我们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是梁山好汉反抗社会不公正行为的思想口号,但某种意义上却是一种以恶抗恶的暴力主义。这种快意恩仇的江湖行为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肆虐横行,社会秩序更加混乱。《水浒传》以一系列社会生活事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残酷的社会现象,这就是在中国专制社会下社会公义的严重缺失。

关键词:水浒传;以恶抗恶;社会公义;缺失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1)01-0013-05

《水浒传》就像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它以其深刻和真实展示了一系列社会生活事件,揭示了社会人性的复杂矛盾以及社会乱相之源,作者在大书特书一个“义”字的同时,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专制社会下颇为尴尬的道德困境即社会公义的缺失。

一、《水浒传》中公义价值缺失的具体体现

(一)视“以暴易暴”为英雄,以“以恶抗恶”为正义,公义缺失导致价值错位

关于英雄的概念,《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时有这样的评说:“夫英雄者,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也。”^[1]可见在曹操这样的英雄人物看来,英雄应该是对整个民族、国家有特别贡献的人物,这种类型的英雄中国文学作品中多数以帝王将相的面目与形象出现。

从中西方文学作品所描绘的英雄人物形象来看,英雄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应包括勇敢、正直、忠诚、有责任,同时英雄也具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和本领,为整个国家和民族造福。真正的英雄在人类进步和民族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应体现进步的要求而被人民广泛认可。

那么《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算不算英雄呢?在这一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往往会出现分歧。梁山

好汉具备了英雄人物基本的品质,比如勇敢、忠诚、超常的意志和本领等,其行为虽然在局部上出于伸张正义的目的,但既没有体现社会进步的要求,也不代表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究其本质,仍属暴力行为。因为暴力行为最基本的特点就是用暴力强制地把属于他人的财产据为己有。从这一点来看,梁山人物多数属于匪盗。

晁盖是梁山事业的实际上的创始人,祖上是本县本乡富户,他本人也并不曾遭受什么直接的压迫和剥削,他走上梁山的根源在于他所代表的是江湖豪杰们的利益。他平素仗义疏财,豪爽大方,“身强力壮”却“不娶妻室”,这都说明他的志向不在自己的小家。他结交的对象多是一些社会中下层的人,甚至有很多游民无产者,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江湖老大式的人物。当素未谋面的刘唐找上门来“送一套富贵”时,他脱口赞道:“壮哉!”(第十三回)他完全赞同刘唐的主意,这是“一套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天理知之,也不为罪。”劫富济贫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好汉行为,出于这样的心理逻辑,从他人手中侵夺财物的行为就有了正当的理由。然而对劫得的财物,往往不会再次分配给贫穷的人,而是用于自己的享乐和壮大自己的队伍。十五回中吴用对阮氏三兄弟说,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这就是他们的理想生活目标。

收稿日期:2010-06-25

作者简介:张文成(1963-),女,江苏连云港人,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及中国古代文学。

再看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他们本来就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不仅谋财而且害命。他们抢得来的财物基本上也是他们在土匪内部进行分赃,而且还不是平均分配。再比如说,少华山,桃花山,梁山,白虎山,清风山,对影山,黄山门,银马川,砬砬山,枯树山等等,这些都是占山为王者的地盘。所谓的劫富济贫也只是所有梁山好汉上梁山之前主要的生财之道方式,后来他们打着劫富济贫的幌子,干的则是贪财好利的勾当。打渔为生的阮氏兄弟羡慕“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生活,合伙打劫,得阳江边搞摆渡的张横“来也不认得爷,去也不认得娘”,“不爱交游只爱钱”,时迁为了攫取钱财而盗人坟墓,张顺杀人越货,孙二娘开黑店,杀人劫财还卖人肉馒头……凡此种种,哪一样不是违法乱纪、残害良民的暴力行为?

几千年前的孔子一句“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道出中国历史文化的—个症结所在。追求公平公正本来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合理要求,但是对于财富分配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后果最终往往导致社会陷入绝对贫穷。我认为这种社会财富分配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是产生社会乱象的一个根源。

除了劫财,梁山好汉的另一个“义”举就是杀人。先看因杀人犯罪而被迫上梁山的几个重要人物。在《水浒传》中林冲是最令人同情的也是唯一令人敬重的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物。他在小说中是一个真正被逼上梁山的典型。林冲由于在奸人种种阴谋陷害之下被逼上死路时,杀死的只是在这桩阴谋案件里的两个小人物,然而对真正陷害忠良的仇敌高衙内和高俅甚至都没有去想如何实施复仇行动。林冲由被冤流放到杀人犯罪,他好像就没有想到要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伸冤,这是因为作者早已给读者预设了一个阅读背景,那就是以高俅为代表的官府掌握着执法权利却绝无司法公正的可能,本身就是“不义”的代表,因而林冲也就不会走司法途径为自己伸张正义,只有逞一己之勇,泄一腔怨愤。

宋江是《水浒传》中内涵最为丰富的一个人物,作者在这一形象塑造中寄寓了儒家的忠君爱民的思想。他出于江湖义气,“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第十八回)私放晁盖。因事情败露杀人灭口,这个行为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然而不论作者还是读者,似乎都对这个暴力行为视为合情合理,因为被杀者已经被描绘成了

不仁不义的道德罪犯。

武松杀嫂向来是被广大民众津津乐道的情节,比起宋江来,武松杀嫂在一定意义上似乎有正义在手。因为潘金莲、西门庆先犯了通奸杀人之罪,武松一开始也想走司法途径伸张正义,但武松的那点证据一方面有逼供之嫌,另一方面由于西门庆在地方上的强势,所以阳谷县的知县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其实对武松来讲,提交证据也就是给县太爷一点面子,政府若替他杀了奸夫淫妇,万事皆休,如若不然,以他武松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连那么厉害的老虎都被他打死了,杀几个人还不是如探囊取物。小说在这个情节上尽情铺垫渲染,把一起情色杀人复仇的案件,描绘成伸张正义的英雄之举。武松杀嫂一案看起来是出于一腔正义,其实纯属私人恩怨的刑事案件,被渲染成充满血腥的暴力格斗事件。后来武松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的一系列行径完全是暴力的格斗。

另外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水浒传》人物鲁智深,他因为镇关西强占民女,性如烈火的鲁提辖本想稍稍惩戒一下这个过于张狂的地方恶霸,并没有想害他性命,不料三记铁拳要了他的性命。与武松相比,他这次杀人不是出于个人恩怨,全是一颗路见不平的正义之心,但他的行为鲁莽,只好亡命江湖,断送了自己的军人生涯。

在《水浒传》中被描绘得很有正义感的杀人行为是杀贪官。中国民众对社会不满,对政府腐败的痛恨直接的发泄对象就是贪官。贪官该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水浒传》冲州撞府,不仅杀官吏,还经常把官吏满门良贱杀得一个不剩!晁盖主政梁山以后,曾特别制定了官民不一样的政策:凡遇到做买卖的从山下经过只劫财不伤人,如果是做官的连人带财一块劫!

一部《水浒传》一百零八位好汉的故事,可以说就是一系列暴力事件汇编。杀贪官,杀奸商,杀淫妇,杀恶霸。小说的作者把宋朝末年这样一个乱世作为小说的背景,给大家描绘了一个混乱、腐败、无道昏君和奸臣当权的恶劣的社会环境,官府成为不义的象征,这样自觉不自觉地就把官民给对立起来,所以与政府对抗的行为被视为正义,而触犯法律的行为也被视为英雄之举。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在创作和阅读过程中无形中把梁山之义与社会公义等同,造成公义价值错位,误把“以暴易暴”当英雄,把“以恶抗恶”视为正义,这样从

根本上颠覆了社会的正常价值体系^[2]。

(二)“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正义口号下的血腥暴力行为,与人类向善的道德诉求相违背

《水浒传》强调“替天行道”,这个“道”,本应是正义、人道、和谐、合理与秩序的象征,而“梁山好汉”,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干的是杀人放火、血腥暴力的勾当。

《水浒传》开篇告诉我们,啸聚在水泊梁山上的三十六员天星星、七十二座地煞星,是被大唐洞玄国师封锁在伏魔殿里的妖魔鬼怪,并且告诉人们封锁在伏魔殿里的这些妖魔鬼怪,“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这群“恶魔”混迹民间,有地方的恶霸,又有乡里的地痞,有市井的流氓,有占山为王的强盗,还有黑白两道的政府官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要犯上作乱。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靠着“忠义”二字凝聚团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杀人越货,其行为实质是社会黑恶势力,只是这个黑恶势力被美化成正义的代表,上帝假借这群人之手大开杀戒,以惩治社会之恶,这是典型的以恶制恶的思维方式。

在前七十回中,作者用一种近乎冷漠的笔调来写一些充满血腥和残忍的细节。比如说在菜园子张青,人肉包子店里边,在屠宰房里头,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看着让人触目惊心。还有杀黄文炳刺心做醒酒汤,李逵杀人吃肉,点灯,四十回李逵在江州劫法场的时候,“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下来,只顾砍人,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江边的百姓撞到的都被他砍下江里去。晁盖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李逵哪里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砍下去。”梁山的“好汉”们视杀人为儿戏,对待妇女也毫无怜香惜玉之情,“手到处青春丧命,刀落时红粉亡身”,而好色的“好汉”,抢劫上坟的妇女,逼迫平民少女作压寨夫人。

为达到扩张势力的目的,宋江屡出狠招,迫使对方就范。关胜本是政府的高级军官,有着万夫不当之勇,但在“好汉”们弄尽手段下落了个家破人亡。为了让秦明入伙,宋江用离间计使其一家十八口人在挥刀一瞬间死于非命。为了逼朱全入伙,李逵毫无人性杀害无辜儿童。卢俊义本是大名府的乡绅,过着安分守纪的日子,梁山出于政治需要,终把一个本来视强盗为仇敌的乡绅变成了山寨首领。这些梁山手段与正义、善良背道而驰,无一不显示出人性之缺失。

凡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律失效、政府缺位的情况下,黑恶势力“江湖”出现了,这是“黑暗的正义”,是借助于“私力”和“黑暗”以恶制恶的行为,这种行为在感情上会受到民众的认可,因为当人人心头积压了太多的仇恨、委屈和冤屈,而社会又没有一个正当渠道来发泄的情况下,民众的心理会产生暴力倾向,而这种江湖暴力将会以其巨大的破坏性横行于社会。

《水浒传》以其艺术的真实让我们看到了专制社会一个无法根治的症结所在,那就是在专制社会中,一旦政府统治失衡,官民对立,民众的仇恨心理一旦被激发出来,将会爆发其极可怕的能量,而以暴易暴、以恶抗恶的暴力行为的后果则是国家动荡不安,百姓生灵涂炭。

《水浒传》被民众喜爱的原因之一就是被压抑的情感得以渲泄,是全民族对不公世道的一种集体发泄。但我们绝不能因为其产生有其合理性就盲目欢呼这种所谓“江湖正义”,因为这种弱肉强食的江湖行为多有着明显的暴力倾向,它带来的危害比吏治腐败更为严重。因为江湖势力不仅不会真正关注广大民众的疾苦,还会直接伤害了广大的劳动人民。李逵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可见江湖势力在其举事之初,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正义旗号以争取民心,一旦实力强大到足以和政府抗衡,他们就会成为颠覆当下政权的主要力量。试想如果他们执掌国家大权的话,必然是对社会文明的一次大倒退。

作者把梁山好汉降临人世作为国家魔难的象征,出于对国家如何才能长治久安的思考,他在情节上安排宋江接受招安,重新为国家效力,外御敌寇,内定叛乱,带领梁山兄弟走向了所谓的“正道”。

在经过血腥和暴力的杀戮之后,这个社会会得到正义和安宁吗?作者给宋江安排了一个悲惨死亡的结局。从表面上来看宋江是死于陷害忠良的奸臣之手,其实是死于上下失信的朝廷之手,也是死于他“宁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道德救赎,最后得到了一个“忠义”虚名,因为统治者对于反抗者绝不会宽恕,而对其惩罚也向来不会心慈手软。这样的结局难道不令今天的人们深思?

人类社会道德的最高宗旨应是引导人们宏扬正义,积极向善,建立和谐社会向来是人类共同诉求,爱己及人,珍爱生命,这也是文学艺术创作应表达的重大主题。如果文学作品不能唤起人们

对生命的热爱,只教会人们如何仇恨杀戮,这是艺术的悲哀。《水浒传》的成书有其复杂的过程和背景,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的思想极为复杂和矛盾,作者在正面歌颂了反抗者的行为的同时也向我们真实展示了暴力反抗的血腥和残酷,让我们看清以恶抗恶给社会带来的灾难^[3]。

二、造成社会公义缺失的原因

(一) 官场腐败,物欲横流,社会道德失范

高俅是《水浒传》中一个重要人物。他原是个浮浪子弟,靠踢得一脚好球,青云直上做了太尉,成了朝廷重臣。高俅纵容养子强占林冲的妻子,设计陷害林冲,直至把林冲逼上了梁山。殷天锡抢占柴皇城的花园水亭。“此间新任知府高廉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而殷天锡“又倚仗他姊夫的势要,又在这里无所不为。”(第五十一回)殷天锡的后台就是高俅。宋江平定方腊回来被朝廷封官赏赐,高俅心生不满,伙同杨戩在朝廷赏赐给宋江和卢俊义的酒中下了毒药将他们毒死。高俅、杨戩、蔡京、童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执法者的地位,而他们却私欲滔天,恶贯满盈,成了社会规范和秩序的破坏者。政府最高层官员品行恶劣,道德败坏,上行下效,造成整个社会道德风气低下。

在《水浒传》中,我们看到官场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已经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比如官场腐败之首的钱权交易现象,蔡京的儿子蔡九被派到江州这等钱粮丰厚的好去处做知府,女婿梁中书到北京大名府任一把手,高俅的侄儿高廉、慕容贵妃的兄弟慕容知府等都做了大官,就连童贯的门馆先生程万里也做了东平府的知府。这些靠裙带关系当了官的,必然要勒索民脂民膏来孝敬他们的上司或靠山。大到梁中书搜刮的十万贯生辰纲,小到一阳谷县的县令也是“自到任以来,赚得好些金银,欲待要使人送上东京去与亲眷处收贮使用,谋个升转”。

还有行贿受贿方面的描写,封建官场上的衙役、狱吏,官职不大甚至无官职,但其拥有的“现管”的权力为其索贿受贿及徇私枉法提供了莫大的便利。林冲刺配沧州时的押送公人是两头受贿,董超、薛霸两个公人收了林冲丈人张教头的贿赂还要沿途折磨林冲,并想在野猪林将其谋害,就是因为两个衙役得到了高太尉更多的好处。武松为帮助施恩夺回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蒋门神便买

通张都监要结果了武松的性命。吏治腐败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还有什么公理可言!还有诸如官商勾结,欺上瞒下,恃强凌弱种种现象不胜枚举。总之,官府权力失控,物欲横流,社会风气败坏是导致公义缺失的直接原因。

(二) 专制制度下人格缺陷

社会公义,理应包含个人享有的公正的权利、人格自尊以及个人社会义务的承担,然而专制制度下的中国人的自私懦弱的性格导致了中国文化中社会公义的缺失,也使中国文化缺乏自信。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用一个好的制度去保护人们的道德,而不是要民众牺牲个人道德去维护有缺陷的制度。《水浒传》人物中林冲所代表的是一种被权力体制所侵害的、所侮辱的人格,这种侵害和侮辱,形成了他奴隶型人格;服从权威,对手极度忍耐,做事谨慎。这种人格是中国人最普遍的人格类型,在其他水浒人物身上也或多或少有所体现。相比之下,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从小在市井里长大的武松,性格就张扬了许多。他行事机智果断,比较善于保护自己,“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不容侵犯的自卫型人格类型。李逵是典型的暴力人格,他没受过教育,文化层次低下,他生性单纯,一身江湖义气,虽然保留有一点民间自发自为的道德观,但其内在的暴力倾向,使他成为乱世之中的恐怖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重要工具。宋江是中国文化中典型的权谋文化的代表,他精通权谋、手腕及社会潜规则,属于较典型的官场型人格,这种人兼有奴隶型与领袖型两种人格特征,有较强的政治欲望,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何九叔是《水浒传》中一个典型的小人物,他所代表的是典型的市民型人格,他在夹缝中求生存,一不敢得罪官府,二不敢得罪社会黑恶势力,虽然有一定的是非观念,但为了保全自己,两面讨好。专制社会的强权意识在本质上侮辱和戕害了人格尊严,人们价值观产生分离与悖反,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存在着价值选择的矛盾冲突。

《水浒传》中性格比较完美的是鲁智深,他身上有一种很高贵的东西,他最后的成佛与其说是他的慈悲之心,不如说是由于他超越凡俗的那份不为名利所困的豁达与洒脱。他保持了做人的尊严与体面,首先不像林冲那样委屈自己,他也不能容忍别人欺负他人,这种高贵的秉性,使他成为梁山好汉中较完美的一个人物形象。

《水浒传》一书,人物众多,除了鲁智深等几

个寥寥可数好汉之外,绝大部分人物的性格中带有自私懦弱的奴性色彩,这种自私懦弱的性格养成中国人典型的道德冷漠症,其典型表现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其结果必然导致公义缺失。

《水浒传》展示了市民阶层的个人利益本位和政治冷漠的倾向,反映了当时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具体生存感受和心理状态。在官民对立的社會中,普通民众认为“天下”并非自己的“天下”,因此也就不会主动承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那份义务,他们除了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去寻求官府保护,进行钱权交易活动外,基本上对政治和社会漠不关心。《水浒传》中李逵、武松、鲁智深等大多数人坚决反对招安。李逵不相信任何招安,当宋江吟《满江红》词,流露向往招安情绪时,他便“一脚把桌子踢起,摔做粉碎,大叫道:‘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后来朝廷派陈太尉来招安,他便把“圣旨”扯得粉碎,对正统政治文化表现出本能的疏离感。他们所关心的是现世的快乐和自由,根本不会理解或赞同宋江“忠义”两全的儒家道德救赎^[4]。

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社会应该表现在对罪恶的

不容忍和惩罚,即我们常说的“恶有恶报”,如果在一个社会,罪或恶不能受到惩罚或追讨,就没有公义可言。所以要求社会民众要是非分明,要对人的恶的一面保持高度的警觉,要有批判的精神,要有对罪的憎恶。绝不能对罪恶产生躲避,忍让,或是包容。

三、结论

《水浒传》成功地描绘了一群挺身而出反抗社会不公正的“好汉”形象,他们打着“替天行道”旗号,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为社会伸张正义,但这种快意恩仇的江湖行为的实质却是以暴易暴,以恶抗恶的暴力强权思想的体现。其结果必然更加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丑恶现象肆虐横行,社会秩序更加混乱。然而这部公开把他们作为正面形象,写尽中国古代社会阴暗面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受到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广泛喜爱。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中国专制文化建构是以“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为基础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准绳的。这种文化的先天性缺陷是造成中国专制社会下公义价值缺失的症结所在。

参考文献:

- [1] 施耐庵. 水浒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42.
 [2] 鲍鹏山. 新说《水浒》[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168.
 [3] 林安梧. 由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新思考[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2):1-7.
 [4] 许纪霖. 知识分子论丛——公共性与公民观(第五辑)[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38.

The Deficiency of Social Justice Under Authoritarian Society of China Through the "Heroes of the Marsh"

ZHANG Wen-c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Lianyungang 222005, China)

Abstract: "Heroes of the Marsh" is a mirror of Chinese society. It provides a wealth of material with deep and real problem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Ti tian xing dao" and "jie fu ji pin" is the ideological slogans against social injustice for Liangshan hero, but the essence is evil and violent. The Fiat allies and the anarchy action intensified social conflicts, various social evils and the social order is confused more. "Heroes of the Marsh" shows us a series of social life and a cruel social phenomenon that proves the fact that is the deficiency of social justice in China's authoritarian society.

Keywords: Heroes of the Marsh; evil; social justice; missing

(责任编辑:李 军;校对:洪 林)